全球化与上海价值

杜维明

[摘　要] 本文系杜维明教授在"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专题演讲，从全球化理论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上海价值"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内涵，认为"上海价值"是"亚洲价值"的一部分，并对当前上海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思考。

[中图分类号] K2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2-0069-05

[作者简介] 杜维明，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全球化与上海价值虽然不是我自己提供的讲题，但正是我想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的题目，给我一个提出浅见的机会。

一般来说，全球化可以分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有趋同的倾向，但文化的全球化必定是多元的，这中间的互动成为国际学坛考虑的热点。除此之外，还有像政治、社会、科技、旅游、移民等各种类型的全球化讲题。主持波士顿大学经济文化研究所的社会学家皮特·博格(Peter Berger)，在三年前开展了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计划，就是讨论文化全球化。我也参加了针对理念和方法的协调工作。他为了刺激大家的思想，有意提出了以韦伯(Weber)命题为线索的极端观点，他认为全球化即使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也有趋同的倾向，而且露骨地表示当前的全球化和美国化等于说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西化、现代化到全球化(或说美国化)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时用诙谐词句提出经济的现代化可以说是"达沃斯文化"(Davos Culture)，就是每年在瑞士的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这一论坛坚信市场经济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不少政治经济(Political Ecnomy)学家认为世界经济论坛所体现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同时，博格说还有一种全球化的力量——教授俱乐部文化，美国大学的教授俱乐部是环保问题、女性问题，或者更狭隘一点只有学术界重视，学术界以外接触很少的，比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论域的生产单位。他这番话后面有个宏观视野，也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的尊严是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因素，既是制度的因素也是价值的因素，具体说这些价值包括自由、理性、法制、人权，还有前面提已经到的个人的尊严，也就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说的个人主义。另外他举出全球化和英文普世化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人类的语言现在大概有6000种以上，经过50年以后可能会降到600种之下。具有强势的语言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虽然现在讲中文的人比英文的人多，但是很多讲中文的人可以用英文来表述。博格还提了一个有很大争议性的观点，说全球化也许和新教(基督教分成两派新教和天主教)的普世化有关系，当然这是韦伯命题的特点，博格本人可以说是韦伯式的专家。比如南韩现在的基督教徒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领导阶层基督教和新教徒的比例也非常高，在拉美目前天主教徒转信新教的人数太多使得梵蒂冈忧心忡忡。基督教的人数在台湾和日本高度发展时期(七十和八十年代)并没有增加很多，目前也只占百分之五以下。中国大陆将来情况如何很难预测。美国学术界对大陆的宗教课题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比如地下教会的情况。当然从科学技术、从贸易、金融、旅游或者是移民各方面来看，全球化的动力不一定和美国有直

• 本文系邵建根据杜维明教授的演讲录音整理，并经杜教授本人审定。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接的关系，至于毒品、犯罪，还有恐怖主义的全球化或者是国际化固然和美国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生态意识的出现也未必只和美国文化有关，不过博格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向和美国化结了不解之缘。从个人角度来说，就是说个性的解放，个人的选择多元多样，越全球化个人的选择越大，个人的解放越明显。博格认为全球化势不可挡，所以非西方和非美国（就是非北美和非西欧的其他的地区），主要是对全球化如何因应的问题。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何以自虑。这实际上是个老问题，可以引用汤恩比的老的观念：刺激和反应的模式，博格认为有四种可能：要么是消极的接受，要么是积极的抗拒，像伊斯兰文化；要么就允许共存，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全球化、国际化，完全是地方的，另外有些地方、有些领域、有些层面则全球化了；再有最健康的但是非常难完成的是刻意经营的一种融合。可是这是最初的构想，三年前讨论文化全球化时的假设，进行个案研究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巴西及德国等地区。研究结束，2002年春天博格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发布会，我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书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多种全球化：现代世界中的多元多样》(Many Globalizations: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中间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就是大陆的一个学者——现在也许在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阎云翔，他特别讨论中国的全球化，他认为一方面中国主动自觉地要在经济上全球化，同时在政治上尽量控制全球化，他描述这一现象为 managed globalizations，就是说最好全球化一方面在经济上拼命发展，另外在意识型态、在政治制度各方面包括网络则设法加以管制，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例证，是不是能够巧妙安排要看大环境而定。另外一般我所了解的很多学术研究认为全球化事实上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地方化和本土化，全球化和本土化事实上像孪生兄弟一样，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互动，这个情况现在使得至少在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 glocal，就是把 global 和 local 合起来变成 glocal"全球地方"，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样说来，全球化和以前的西化和现代化最大的不同（当时在现代化理论开始的时候，在50、60年代，特别是在哈佛，一般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现在看来全球化不一定趋同，全球化会导致多元的倾向，会加强地方认同和根源意识。这个地方化的过程中间大家特别重视的是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文化认同。就连世界经济论坛也改变论题了，即我刚才提到的达沃斯文化，所谓的经济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认为只要全球化能够在经济方面有所发展，举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水位能够向上升那么各种不同的船也能够浮上去，大家都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但是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发展贫富不均的问题和其他的矛盾冲突事实上更尖锐了，这种信仰受到了质疑。所以从1999年面向千禧年的关头，世界经济论坛就主动讨论宗教和文化认同的因素，我也应邀参加了这项讨论。为什么注重本土化，一种寻根的意愿，也就是根源意识？因为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谓的原初联系，这是用了一个不太符合汉语习俗的名词，所谓原初联系包括族群、性别、年龄、语言、地域（就是祖国的观念）乃至阶层或者信仰，这些根源性非常强的原初联系突出了。全球化不仅没有减杀根源意识和它们在国族中起的作用，乃至在国际社群所起的作用，的确越来越加强了。因为这个原因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2001年是所谓的"文明对话年"。观点是这样：全球化会导致霸权，全球化也可以使得世界各地人民因为地球村的出现、生态环保等问题认为大家都属于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成为人类全体的救生艇。本土化容易导致孤立、排他和攻击性非常强的文化认同乃至原教旨主义，本土化也能够发展健康的、有根源性的认同。如果要使得全球化能够助长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出现（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愿意促成的），避免霸权的危险，同时本土化会形成一种开放的认同和根源性意识，并且竭力防止孤立、排他和攻击性的原教旨主义的出现，为了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健康互动、良性循环，必须对话。没有对话的机制在这些方面就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我们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检视上海的价值或者价值取向，必须在方法论上超越排斥性的二分法。二分法是思考所不可避免的，但是排斥性的二分法也就是非此即彼的那种思考模式，比如说传统和现代的二分，如果是传统就绝对不是现代，就是排斥性的二分。在现代化理论如日中天的时代，不少学者以为传统社会的消失就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目前大家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常会触及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及现代化可否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的问题。还有一个排斥性的二分法也必须超越。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所提出来的"文明冲突"，曾以西方和西方之外的二分为前提。事实上西方19世纪中叶以来便在西方之外，不是邀请而来是破门而入喧宾夺主的，充分暴露殖民主义和霸权，近来西方之外也积极进入西方，比如外劳和移民。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化交流而进入西方的例子也很多。再有就是前面提到的全球和地方，这两个同时并进的现象也不能用排斥性的二分法来理解。以日本为例这个问题更复杂，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从福泽谕吉倡言"脱亚入欧"以来，它的现代化和所谓的国际化，和它的地方化也就是本土化形成了具有创意的互动，所以它越现代化也就越日本化，把各种不同日本以外的制度和价值日本化了，成为本土资源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的日本碰到了极严峻的新考验，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也很难应对这一新考验，就是日本的再亚洲化。所谓再亚洲化就是回到亚洲。这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一个区域化的问题，区域化的问题具体说就是要面对韩国、面对中国。真要面对就必须正视二战所带来的阴影，如何因应这个挑战？既要全球化、国际化，又要地方化，同时还要区域化。我很关注目前日本知识界所面临的大挑战，需要同情的了解也应有批判的认识。

我的一般印象，认为说上海确有特色，这只是泛说，是非常肤浅的认识，因为我不是从事上海研究的学者。这次开会确为我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让我把深受启发所获得的观感，提供大家参考。

毫无疑问，上海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我们不要忘记，在1930年代上海曾是世界第五大都会。我们也不要忘记，鸦片战争前夕，好几位经济史家提到，是不是正确我无法判断，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强势和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势可以相当。开风气之先从17世纪利玛窦和徐光启的时代，比如19世纪的林乐之以及后来的王韬，都体现了这一特色。有的学者指出，上海有外籍人士所组织的科学团队，这在其他地方不易看到。这个科学团队基本上不从事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如物理、数学之类。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工业技术，像纺织或者医学，这是它开风气之先的特色之一，比较"实事求是"。

另外，一提到上海大家会联系到企业精神，盛宣怀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经济领域中，上海有自己资本累积和商业资本运作方式。另外大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30年，上海的艺术，音乐、戏剧、电影甚至歌剧不仅在中国和东亚，即使在更宽广的国际社会都相当突出；出版事业比如商务印书馆极为蓬勃，有学者认为30年代上海所出版的书籍数量可以和美国全国的出版数量相比。曾在上海居住过的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就表述过这一观点，只是印象还是经过具体证实，我不知道。通过出版事业，上海的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都很有活力。另外，很多学者特别是同事李欧梵教授，一再强调的大众传播，包括上海的收音机、广告、副刊、画报和小说，上海更是一支独秀。很明显，上海价值，不是静态结构，而是动态过程。上海的价值体系是在变动不居的时空中转化，因此在时空中转化的价值体系不像制度或政策转换那么神速，而是逐渐的转化，但既然是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结构就必须避免本质主义的描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关于上海的价值取向我们可以分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949年以前，第二个时段是1949年到1992年，第三个时段是1992年到现在。

到底上海是什么时候开埠的，也许可以追溯到南宋。至少在清朝中期，上海的港口的容量以船只数量来计算，已是中国第一大港了。和内地不同，上海有内陆与腹地，不止是海洋贸易而已。从1839到1949，上海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多元、多维、多层次的复杂过程，逐渐形成了今天一般学者所认为的暧昧的身份认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学者群居上海，但是并没有主动自觉地参与上海身份认同的营建。这点很容易理解，因为认同的观念是60年代才开始流行的，所谓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乃至各种不同专业、不同社群的认同才成为大家讨论的问题。现在好像有认同泛滥的倾向，大家对认同讨论的非常多。从象征意义来看，今天的上海话，据我所了解以前根本不存在，是经由苏州、宁波还有广东等地的方言杂和而来的，地道的上海话应是浦东的方言。如果说现在上海话是上海认同的重要因素，那么上海是通过很多附近的文化资源融合而成的，如苏州、宁波等地都成为上海形象或者上海认同的塑造者。正因为上海有移民，有侨民，如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印度人、德国人等长期居住，上海才会有一批传奇性的外籍人物，如哈同。上海人是一个混合体，是各种不同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族群之间的互动组合而成，比如混合法庭就能够体现这点。在上海有很多离散的社群，所以后现代称之为混合体，hybridity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杂种或者杂交，那么这种的早期现象，在上海的历史进程中屡见不鲜。很多学者都表示，太平天国在塑造上海认同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定义性的大事；租界成为江苏一带文人的避难所，上海成为孤岛，难民有一种无根之感。因为这个原因上海的价值和北京很不相同比较接近广州，是属于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城市价值。也有学者认为，上海是一个社团网路的都市社会。上海的民间社会非常蓬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学、书院、工会，及慈善公益机构，除了救火、赈灾以外还有为了对付饥饿的赈粥会，有筑路、建桥的组织和其他都市没有的民间组织。上海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团队精神，落实为多彩多姿的社会生活，突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可以这样说上海的价值取向是开放的、容忍的、而且实用的。但是1949年以前上海并没有形成主动自觉的身份认同。

1949到1992这一时段，上海基本稳定，没有显著的发展，但要想正确地掌握上海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相当困难，也触及很多敏感的问题。总体来说，上海价值是以全国利益为目标，由一种工具理性和社会工程而规定。毫无疑问，站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视域中，上海的定位是政府(北京)根据全国总体利益考虑而形成的，是外部因素为前提强加的。这种定位并不能够契合地方政府和显达，所谓官民共同认可的自我形象和自我理解。另外官和民(民包括知识分子、企业家和一般市民)之间，对上海的价值定位也必然有一种潜在的张力，甚至明显的冲突。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从质和量的方面，都担负了非常沉重的任务，有很多数据可以考察，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直到1987年以前整个国家税收中上海占了很重大的比例，这和广州相比极其明显。说说我自己的经验，我曾在上海念了4年书(1945年到1949年)，1980和1985年我特别安排到上海参观了两次，单就市容，特别是建筑来说，30多年没有变化，5年之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露骨的说只是更陈旧了。好像一条巨龙被外力镇压，长期陷在无用潜龙的困境之中。可以想见上海人和广州人或北京人相比在生活品质上是有显著的差距。上海人敏感、细心精明、信息量大、观察敏锐，自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极深的委屈。改革开放以来跃跃欲试，跃到"飞龙在天"的大好空间的意愿非常强烈。因此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上海带来了商机和发展的空间，上海能够在很短的几年像彗星一样突然成为国际上非常耀眼的大都会，我想除了上海人好像与生俱来的企业精神外，和过去50年的遭遇有密切的关系。不少从事上海研究的学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1992年以来的上海包括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和1949年以前的上海有很多相似之点，甚至有些人说有连续的痕迹。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1949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的上海也许只是发展大势中的例外而已。但是1949年到1992年曾为上海的市民、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官员，创造了发展了凝聚力的机缘，大家共同为上海的命运和前景力争上流。根据各种迹象来看，20年代、30年代上海的风气，比如说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现实主义现在又开始大行其道了。那么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那些1949年以前的积极价值如何又能重新浮现呢？这是我关注的课题。自由、容忍、比较开放、实用和多元多样如果真能成为上海人的核心价值(当然并不表示狡诈、浮华机灵和软弱的积习即可一扫而空)那么上海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龙头便有历史意义。前面提到的皮特·博格描述全球化的引言里，强调多形多姿的取径和形成，但他坚持"个性解放"是本质特色，这和他突出"自由"的现代理念如出一辙。这种观念至少在上海的年轻人中间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姑且不立即判断优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1992年以来，在上海已出现一种自动自觉地向崭新的身份认同而努力的势头。譬如，像这次学术会议(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它本身即是对上海的身份认同如何形成共识的学术工作。既然这种工作是学术界和媒体合作的共建，那么形构身份认同的努力是从下到上的，而非从上到下的文化工作。固然学术本身即是知识分子刻意经营的事业，不是工农兵及市民们所关心的事情，因此是精英主义，但既然不是官方所导引的研究，那么这体现民间社会活力是不容置疑的。另外再以举办2010年世博会为例，是否也是上海人，不论是官或民大家共同为塑造上海的形象乃至上海认同而努力。世博会在2008年以后两年，也就是北京奥运会以后两年召开，我相信上海确有和北京进行良性竞争的雄心壮志。北京所代表的"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必定会成为上海世博理念的参照。这样说来，当前上海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是以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为基础，这也就是上海人主动自觉地塑造上海身份认同的显例。这个情况表面上和1930年的上海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但深展考虑确有极大的不差异。其实，1949年到1992年的上海经验为今天上海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创造了条件。

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能够带来民主政治，这是有争执的。但是市场经济带来了多元的倾向，而且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再强调前面的观点，从价值取向来看，1992以来的上海和20、30年代的上海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天的上海人正在主动自觉地共同塑造上海的身份认同。参与这项跨世纪工程的是上海的公众知识分子，这些公众知识分子来自学术、媒体、政府、专业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从全球化的大的趋向，特别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取向来看，十七、十八世纪启蒙以来，扎根西方的价值，如我前面提到的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在塑造中国的现代化，乃至在上海的身份认同方面已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是除了这些价值以外，团队精神、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和大众富裕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现代价值。特别面对国营企业的巨大转型，全国大概有1500万人失业，更有超出1亿的流动人口，面对这些现象，公益的问题、同情的问题，直接和人权相对的情和理的问题，在上海的特殊的情况下这些复杂的价值如何扎根？因为最好的价值并不一定配套，比如自由和平等是冲突乃至矛盾的，越有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贫富不均的情况就越严峻，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除了发展经济资本以外必须发展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无法量化的，比如以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例，经费增加了10倍是不是就表示学术的风气就必然大幅增加了？很难说。这要通过所与所之间、所内乃至整个院和其他高等学府的互动才能够培养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特殊社会资本。哈佛政治系的罗伯·普南(Robert Putnam)做过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以意大利为特案，意大利的北边和南边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组织相当，但是北边的民主很健康，南边则困难重重，主要的原因是南方人与人，社群与社群之间的沟通机制薄弱，没法积累社会资本。印度的拉克瑙(Locknow)，是一个南亚著名的和平之都，周边一带常有宗教和种族冲突，但是在拉克瑙则相安无事。系统的研究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个老传统，就是各种不同的宗教的领袖，包括伊斯兰的、印度教的、基督教的领袖有定期聚会的习俗。矛盾冲突的可能在他们的讨论中就预先化解了，这是积累社会资本以达到和平共处的好例子。目前中国的教育领导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能力但却忽视了文化能力。文化能力不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能量化，是一种培育人才的素质教育。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历史），通过文本而体现的想象力、创造力（文学）；以及反思的方法与实践（哲学）都是文化能力的内容。这些能力如何提升？如何在大家都趋之若鹜地投身企业管理、外文和国际贸易的大学的环境下，提升文化能力？如果大学对我刚才所提到的哲学、历史、文化等不注意发展，那么社会的文化能力绝对薄弱。社会文化能力不够，社会的持续发展便会像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本，不能长期维持。另外，在智商之外，我们要发展情商和伦理智慧，物质条件之外必须注重精神资源。技术官僚以工具理性的方式通过社会工程的管理来塑造上海的发展策略乃至上海的身份认同，是很有局限性的，会导致因短视而缺乏长期战略的眼光。上海目前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上海的价值取向以及上海的公众知识分子在塑造上海的身份认同所做的努力，不仅对中国大陆乃至对文化中国各地都有极具重要的涵义。文化中国包括像台湾、香港、新加坡、海外华人社会乃至迅速增加的国外社团。国外社团由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是对有关中国的学术感兴趣的人士所组成的团队。

我提出的文化中国的构想，希望促成三个意义世界的健康互动。第一意义世界：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及新加坡；第二意义世界：海外华人社团（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日本、韩国以及北美，当然也包括欧洲、澳洲、新西兰、俄国、东欧、阿拉伯及非洲等地），以及第三意义世界：外籍人士（特别是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但全球各地包括太平洋岛屿也都纳入范围之中）。一般印象是只有外籍汉学家才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我认为这种观点太狭隘，与事实不符。我的构想很宽泛，学术、政府（特别是外交）、媒体、宗教、职业团体（如律师及医生工会）及社会组织（特别是NGO，非政府组织）等等凡是和中国有交涉或者联系的团体都纳入其中。为什么要提出如此包罗万象的理念？回答很简单，文化交流、渗透、牵制比市场经济和地缘政治更弥散，几乎无孔不入。

总体而论，除了第三意义世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薄弱、价值领域单调，而且在各地区、各行业以及由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政治取向、社会阶层、经济利益所形成的社团都因多元多维的差别歧异而发生内耗。所谓"薄弱"，是指物质考量涵盖一切和佛教、基督教、兴都教以及伊斯兰的"文化圈"相比，便显得因缺乏终极关怀而庸俗势利。所谓"单调"是指集中于经济（钱）和政治权两大领域，对人文（文史哲）、艺术以及宗教精神则轻忽鄙视。"内耗"的例子太多不胜枚举。我们的政治和学术领导在国际论坛大力提倡"和而不同"，反观文化中国的现实，很难自圆其说。

一个正在腾飞的民族，不能没有自知之明。培养批判的能力（绝非因政治高压而无法回避的"自我批判"），才能提升自知之明。不以深刻价值为基础的政治论说很难逃避宣传的印象，没有深刻价值为动机的媒体很难不落入政治或经济权势的巢臼，不能体现深刻价值的学术只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或为利益驱使而勉强为之的职业而已。深刻的价值无法脱离传统文化，试问欧美知识界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有哪一位不具备源远流长的传统谱系？在西方知识界内没有体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汀、康德和黑格尔的人文学教授不多见，以报道新闻分析时事为主的西方媒体文化信息（如书评）的比重绝对高于娱乐花边。

文化中国的主要困境是知识界乃至学术界的"文化传统"中"传统文化"的因素太少。西方价值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冲击，使得文化中国维系社会有机整合的各种权威都动摇了，基本的做人道理也（如诚实）迷失了。在旧价值体系急速崩溃而新价值体系（如资本社会赖以生存的信用、法治、理性、权利、公开、透明和公正）又无法建立的危机中，上海的特殊性和上海人的个性起了巨大的作用。以惊人的速度、敏感的反应、掌握信息的能力以及具有弹性的务实，上海1994年以来在抓住商机的效率上发挥了史无前例的能力和创意。但是接踵而来的情欲泛滥和黑道金权的牵制使得上海的素质既无法一洗1949年以前的浮躁也不能彻底摆脱1949到1992年之间的僵硬。即使以突出上海活力的证券市场来说，还需要一再强调改进更新才能达到纽约、东京或香港的水平。

借用艾登·柏林（Isaiah Berlin）的比喻，上海是典型的"狐狸"。希望上海也学作"刺猬"不合情理也没有必要。但上海的海派（乃至洋泾浜）特性，有现实感（未必有历史意识），有海洋视域（不必有中原气象），也有广结善缘向世界学习的雅量。从地理位置而言，上海不仅居沿海之中也是内地货物汇集的核心。如果上海能深化自身的现实感、视域和雅量，为文化中国提供"学习文明"的典范，上海的地方价值便有全球的意义。

（责任编辑：周　武）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bstract

Social Change in JiangNan Society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Suzhou&Huizhou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ANG Li-xing

With the migr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s to Suzhou,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areas became much more frequently. Large amount of commercial capital were brought to Suzhou by Huizou merchants, and revitalized Suzhou society. But the commercial profits feedback to Huizhou inversely strengthened the old order of Huizhou lineage society. Actu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different regions was reflected in every aspect of social life.

Cultural Quality of Jinshi In Suzhou&Huizhou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Suzhou&Huizho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U Jian-hu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atio between Jinshi and whole population, the precedence of Jinshi, and the works of Jinshi,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reasons that led to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qualities of Jinshi in Suzhou&Huizhou.

Lineage Mi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Suzhou&Huizhou in Qing Dynasty: Taking Dafu Pan Family as Example XU Mao-ming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Suzhou&Huizhou was fulfilled by the way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lineage migr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s. While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of Suzhou, the merchants brought the lineage idea back to Huizhou, which maintained the stability of Huizhou society.

Local Ideology and Decentralization Thought of Literati in Jiangnan in Late Ming Dynasty CHEN Jia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literati to local interests in Jiangnan showed a tendency of strengthening. Meanwhile,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vertical rule of autocratic government was the greatest obstacle standing in the way of specific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Much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is phenomenon.

Migration and Local Society in Huzhou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FENG Xian-liang

Huzhou was locat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aiHu Lake. Local government always showed much concern on plant protection and river system stability in this area. In Qing Dynasty, with increase of migrators, plant destruction, soil erosion and many social problems concerned rose in Huzhou rural area.

Pirates and Seaside Socie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Jiangqi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ZENG Xiao-quan

Population pressure, weakness control of government and shelter of Vietnam regime were main reasons that led to prevalence of pirates in Guangdong during Jiangqing period. The emergence of pirate alliance in 1805 made them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Globalization and Shanghai Value DU Wei-ming

Professor Du Weimig addressed this speech in Symposium on 160th anniversary of opening of Shanghai. In this speech, he elucidated the different meaning of Shanghai value in different 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theory.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